



陆学艺

1978年以来，陆学艺一直在从事农村发展和社会学的调查和研究，1988年到1998年，他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，1998年退休后，他仍然领导着中国社会学会，他主持的《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》蓝皮书系列、《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》等都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。这位现年71岁的老人说，自己一生总在孜孜追求这样一个梦想：就是希望中国成为一个“和谐社会”。

希望实现“和谐社会”

现在由于社会不协调引起的问题越来越大，而且也引起了上层的注意，因此，十六届四中全会特别提出要构建“和谐社会”。我认为这很符合我们的实际，我希望这个规划能够实现，比如到2020年我们全面实现小康的时候，不光是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，而且是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，城乡协调发展，整个社会公平、公正，成为一个和谐的社会。

在我们搞社会学的人看来，现在应该说国家的经济发展已经上了轨道，但是社会发展还相对滞后。这样的问题我们已经谈了好多年，当时有这样一个说法，认为只要把经济搞上去，也就是把蛋糕做大，好多问题也就解决了。我记得当时有个老同志说，“现在我们的问题80%都是因为穷。”但是现在我们经济搞上去了，蛋糕做大了，其他问题并不像想象中那样也解决了。经济虽然翻了两番，社会问题却更多地出现了。因此，早在1990年代我们编《中国社会发展报告》就提了出来：经济和社会要协调发展，经济是第一的，但一定要有第二，光是经济建设的话会产生问题，另外经济发展的目的就是要改善人民的生活，所以一定是经济和社会要协调发展。这些认识十几年来得到了社会的认可，特别是现在终于被国家吸纳到政策方针的目标上，已经形成了党中央的文件，这让我们感到很高兴。

在我看来，这个社会的和谐比稳定更重要，和谐的社会一定是个稳定的社会，但稳定的社会不一定和谐，所以我希望国家提出的理想能够付诸实现，这需要在体制上进行改革。

要实现“和谐社会”，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有两个。第一，从体制上来说，我们从计划经济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，走上这条道路之后国

家发展很快，各方面的进展有目共睹，但有一个问题是，计划经济走了几十年，有些体制已经根深蒂固，这些体制渗透到方方面面。现在不光是经济体制还没有完全改好，特别是社会体制和社会事业改革，要我说可能还没有破题。所以要建立和谐社会，就必须把当年计划留下来的制度、做法等等改过来，比如现在的人口制度、户口制度，这些都是为计划经济服务的，如今搞了市场经济就应该把它取消，还有我们的人事制度、社会保障制度，都应该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把它改过来。如果不首先把体制改过来，光讲和谐社会没有用。

第二，我们的社会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多元化的社会阶层结构，因此，国家应该根据现在形成的状况，对分配不公、城乡差别、贫富差距、阶层之间差别等等问题进行合理的调整。对于这些问题，我觉得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应该高度重视，一方面要使得大家各尽所能、各得其所，甚至各得其利；另一方面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不能自发的，国家必须对之加以不断的协调，使得各个阶层可以和谐相处。比如现在我觉得我们的农民工阶层，由于户口的限制，他们干的是城市工人的活，却不能得到相应的待遇，相反，老板阶层的收入不断提高，农民工却十多年一直拿三四百块钱的月工资，这样的话社会一定不会平衡，不会协调。所以我们应该重提1950年代的“劳资两利”，现在基尼系数已经很高了，应该缩小到0.4警戒线以下。

我们有种思维就是“零和游戏”，觉得你多了就是我少了，但从社会学家的角度来说，这个国家无论是政党、政府和群众，还是各个阶层之间，都可以走共赢的道路。在这一点上，我觉得我们党的作用应该站在中间协调

的立场上。现在有人批评说政府站到了某一边,或者政府也经营城市,动不动就产业化,如果真是这样的话,政府已经是利益的一方了,它在协调的时候肯定就倾向于既得利益方,这是不行的,政府应该站在公正的立场上,它是裁判员。

近几年,我们的城市化、现代化、工业化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,但是这个过程确

实有一部分人被牺牲,比如农村失去土地的农民、城市里下岗的职工、住房拆迁户,这些人他们都做了贡献,而且在我看来,他们的成本付得太多,收入的太少,这对他们不太公平。改革的成本不能只让一两个阶层来承担,而应该大家共同承担,有时有些偏重不要紧,但是现在偏差得太大了。所以现在国家提出来:第一次分配,要注重效率,

第二次分配,要注重公平。这个方向虽然已经提出,但实际做还要有一个过程。

对我来说,我觉得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经济地位,应该说享受到了改革的成果,但作为一个社会学家来说,总觉得这个社会还不是十分理想,还不太和谐,甚至有些地方还不太安定,我觉得还是应该为之奋斗的。》

官产学媒达成改革共识

应该说一二百年来,许许多多的中国人都在做同一个梦,就是希望我们的国家富强起来,但这个过程十分的艰难。各种道路都试过,有的时候试得很惨、很痛,新中国成立之后搞了30年的计划经济,然后才进入到25年来的改革开放。这个改革开放就算是摸到门了,虽然也有波折,但这个波折比起一二百年来的历史并不算什么,所以现在应该说已经看到了曙光。这已经很不容易,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有幸融入这个转型的历史中间,还是很欣慰的,当然也跟这个社会一样经历了很多痛苦。

虽然摸到了路子,但是我们仍然发展得非常不平衡,所以大家感觉到这个社会有所失衡,现在短期行为、浮躁心理很多,贫富差距很大。现在国家处在一个关键的环节,大家希望它再能稳定地发展20年,而能不能做到这一点,很大程度上是人们——特别是我们的“官、产、学、媒”得加强相互之间的互动,更多地形成一种共识,能够跟国家领导层和决策层保持一种建设性的联系,争取能够做出好的战略性的决策。同时要能关照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,帮助他们解决问题,鼓励他们通过自己的奋斗抓住发展机遇。这个“官、产、学、媒”的责任是很重要的,它是中国转型时期特殊的一个中坚阶层。我们还没有一个稳定的中产阶级,但一个历史不能没有中坚阶层,它是源源不断的动力和智慧支持。

作为社会的中坚阶层,“官、产、学、媒”现在已经有了力量,撑起了各自一方的事业,那么它应该再加点责任,加强相互的联系。国外有“华盛顿共识”,中国也要有“中国共识”。其实在全球化、信息化这样的时代里,共识可能是



石小敏

夜深了,石小敏低沉的声音通过电话反而变得更加富有穿透力,这位不折不扣的老三届,有幸站在国家体改委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高度,向记者诉说着一个中国人的“转轨之梦”。如果从1983年调到国家体改委算起,到如今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任上,石小敏参与中国经济改革的方案设计和调研工作已经20多年,他告诉记者,能看到这个历史是很欣慰的事情。

石小敏